

毛泽东的性格与新中国的政治走向

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建国初年

周恩来的治国理念

林蕴晖 著

# 国史札记

## ● 人物篇 ●

陈云“有时也很硬”

邓小平对中苏论战角色的自我评说

李先念“杞人忧天”

邓子恢与中央农村工作部

陈毅“是一个好同志”

胡耀邦与“三宽”方针

江泽民与改革的市场取向

林蕴晖 著

# 国史札记

• 人物篇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史札记. 人物篇 / 林蕴晖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2. 10

ISBN 978-7-5473-0509-6

I. ①国… II. ①林… III. ①中国历史—现代史—文集②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IV. ①K270.7-53②K8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5043 号

## 国史札记——人物篇

---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 340 千

印 张: 23

插 页: 4

印 数: 0,001-5,100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509-6

定 价: 40.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52069798

# 写在前面的话

2008年和2009年,东方出版中心先后为我出版了《国史札记·事件篇》和《国史札记·史论篇》,有的读者在见到我时问道:什么时候出“人物篇”?我一时语塞,因为从来没有想过。但此事一直在脑际萦绕而放不下。经过一段时间考虑,觉得写人物不一定写一个人的生平思想的全貌,抓住一个人物一生中的某一点,即写一人一事,未尝不可。《毛泽东的性格与新中国之路》一文,最初起草在2007年,在有了上述想法以后,才下决心按一人一事的布局来写了。涉及的人物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李先念、陈毅、邓子恢、李立三、华国锋、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这些单篇文章的立足点:主要着眼于阐明历史人物在某一事件上的主张,对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总之,目的是为了弄清人和事,而不是简单地去评论历史人物的功过。把胡绳、龚育之谈编写党史作为附录收入,意在向读者介绍二位历史学家的科学历史观。

2012年的我,已进入耄耋之年。《国史札记·人物篇》能在这一年面世,对我来说是一件幸事。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东方出版中心的大力支持,感谢责任编辑的辛勤劳动。

林蕴晖

2011年11月完稿于佛山碧桂花城

#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	1
毛泽东的性格与新中国之路 .....	1
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建国初年 .....	32
刘少奇对匈牙利事件教训的思考 .....	107
周恩来的治国理念 .....	116
朱德的感喟 .....	123
陈云“有时也很硬” .....	130
林彪与 1960 年军委扩大会议 .....	164
邓小平对中苏论战中角色的自我评说 .....	176
李先念“杞人忧天” .....	201
邓子恢与中央农村工作部 .....	209
附一：1959 年至 1961 年中国粮食产量和 人口状况一览 .....	260
附二：《中国人口》各省、市、自治区分册公布的 1958~1962 年间的人口死亡数和死亡率 .....	262

国史札记·人物篇

李立三主张工人自己办工会 .....	267
陈毅“是一个好同志” .....	273
华国锋与改革开放 .....	281
胡耀邦与“三宽”方针 .....	289
赵紫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	295
江泽民与改革的市场取向 .....	302
胡锦涛、温家宝与“以人为本” .....	311
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316
附一：从消灭私有制到以人为本——六十年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历程 .....	329
附二：从苏东剧变看什么是社会主义 .....	342
附录：胡绳、龚育之谈编写党史 .....	352

# 毛泽东的性格与新中国之路

199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上下两卷本的《说不尽的毛泽东》,以后又陆续出版了《毛泽东传 1893~1949》和《毛泽东传 1949~1976》。可以说,对毛泽东的研究,始终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原因是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之大之深,无人可及。

对毛泽东的研究,可以有不同角度、不同层面。

国内研究毛泽东的前辈,李锐先生说过:对毛泽东的性格有一定认识的话,对研究毛泽东的有关历史事件就比较容易,不然很多问题不好解释。

毛泽东的性格有什么特点?李锐先生说:“他是绝对自信,就是对自己有怀疑的时候,也是绝对保护自己。绝对自信,绝对保护自己。”<sup>①</sup>

说“绝对自信”是毛泽东的性格特点,从他年轻时代的诗词中就可窥视一斑。1925年写的《沁园春·长沙》中就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1936年的《沁园春·雪》,更有“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壮句。只要他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办,一定要办到。

《毛泽东传》作者在文中也说:他的个性很倔强。毛泽东一向不服输。<sup>②</sup>

毛泽东这种绝对自信的豪迈性格,当他的决策正确的时候,对中国社会发展无疑带来的是正面影响(如1935年的四渡赤水,1947年撤出延安);而当他的决策是错误的时候带来的却是灾难。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出现过一些偏差,经历过一些曲

---

① 李锐谈毛泽东与高岗,2004年11月28日,林蕴晖访问李锐的谈话记录。

②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0、1778页。

折和挫折,如:1953年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到1958年发动“大跃进”,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对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本人曾先后发表过《理论的误区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载《中国经济时报》1996年5月17日第3版,《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3期);《陈云谈“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载《学习时报》2006年6月12、19、26日;《新华文摘》2006年16期)两篇文章,前一篇是从理论层面作了分析:由使资本主义绝种到“反修、防修”;后一篇是从制度层面分析,由个人崇拜到个人专断。这里,我想是否也可以从领导人的个人性格特点来分析一下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下面分别从建国后这段历史的若干事件中看毛泽东的性格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 一、毛泽东的自我画像

关于毛泽东的性格特点,他本人有过一段自我描述,1966年7月8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sup>①</sup>

所谓“虎气”和“猴气”,人们有过多种解读,就老虎本身来说,它是百兽之王。所以其中一说,“虎气”可以解释为傲视群雄的“霸气”。从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有个人崇拜的讲话看,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从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是不允许别人分权的。

毛泽东当时说:

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但也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学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

---

<sup>①</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引者注，李锐笔记有下一句话：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sup>①</sup>（引者注，李锐笔记还有以下的话：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sup>②</sup>）

所以，毛泽东的权威是不容别人挑战的。对于毛泽东要把权都抓到自己手里的这种“虎气”或“霸气”，杨尚昆在一次谈张闻天与毛泽东时说：“1940年我回到延安，闻天当时就只管宣传，别的事他一般都不管。我看他那时很苦闷……甚至毛主席在延安讲过这样的话，意思就是你又不管，你又管不了事，你还把着这个位子（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笔者注）不让出来。闻天跟他去谈过一次，这是闻天跟我讲的，这个事情我统统交给你，我不管了，一切听你的。毛主席当然欣然接受了。他就是要把权都抓到手里。”<sup>③</sup>

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1956年“反冒进”是政治性的错误，他强调要反分散主义，提出了八首歌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他说，过去中央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权在国务院。有人反对党政不分，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最好的好意也是想将一半大权揽过来。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集中到党委，到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这显然

①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页。

②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页。

③ 《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张培森整理。《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第33页。张培森注：张闻天1943年在《反省笔记》中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就已经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总书记让出来，是毛泽东当时不同意提出这个问题；《笔记》又申明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

是指周恩来在向党中央揽权。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解释说:“这八句歌诀,产生于1953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1953年那时的分散主义,指的是政务院1952年12月批准财政部发布的“新税制”,毛泽东认为此事未经中央讨论(事实是向他作过汇报),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错误。为此,中共中央作出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并撤销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

在1958年8月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为实现钢铁翻番,毛泽东更强调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sup>①</sup>

上述表明,毛泽东的绝对自信的性格,反映在权力的观念上是要绝对集中,不允许有人与他分享权力。

## 二、好社会主义之大, 急社会主义之利

毛泽东的霸气,不允许有人与他分享权力,就是要按他的设想来指点江山。

1957年5月,毛泽东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在见到张奚若时,征询张对党的工作有何意见?张奚若将自己平时的观感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的四句话。后来,毛泽东针对这四句话反批评说:“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利,厚今薄古,何罪之有?”<sup>②</sup>

“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利”。这确实是符合毛泽东自己的性格的。

对于新中国建立之后,何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1949年在讨论《共同纲领》草案中,曾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在总纲中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前途规定出来。毛泽东在8月26日表示: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

---

① 毛泽东在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19日。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96、97~98页。

② 贾巨川:《张奚若与“十六字”诤言》,《纵横》2008年第2期。

果再说的远一点就变得空洞了。<sup>①</sup>后来,在政协会议期间,当有的代表向毛泽东提问要多少时间才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毛泽东回答说:“大概二三十年吧。”<sup>②</sup>但是,经过短短三年,毛泽东就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确定要在十五年内使资本主义绝种。对这个导致新中国历史重大转变的原因,史家有过多不少探讨,权威著作《毛泽东传》有如下解释:

关于何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建国时估计,大约需要二三十年时间。”“然而到一九五二年夏秋之交,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一些超出原来预料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第二个变化是,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三个变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这三个重要社会经济现象,其中最引起他注意的是,“中国工商业产值中公私比例数字的变化,成为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依据”。<sup>③</sup>

如果把视野再放宽一点看问题的话,也还可以找到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另一层面的原因,这就是要向斯大林证明毛泽东不是“铁托”,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1953年斯大林过世以后,尤其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在谈到斯大林和中国革命问题时,多次讲过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先是不准革命,说再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我们打胜了又怀疑中国党是铁托,或“半个铁托”。<sup>④</sup>

关于斯大林怀疑中国共产党或毛泽东是铁托的问题,自俄罗斯公布原苏

---

① 转引自熊华源、汤桂芳:《〈共同纲领〉诞生记》,《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访问苏联期间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的国有化,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1949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团校第一期毕业典礼上又讲:20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进入社会主义。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页。

② 转引自龚育之:《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③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240~241页。

④ 参见沈志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121页。《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2页。

联的大量档案以来,尚未见到原始证据。但这绝非是空穴来风,作为1949年毛泽东访苏的首席翻译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旁证。师哲在毛泽东访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在莫斯科为毛泽东举行告别宴会一节回忆说:

“经过一轮祝酒后,斯大林起立致词。他讲话很轻松,没有稿子,由我翻译,大意是: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讲到这里他环视大厅,看到没有南斯拉夫的大使,于是他说: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圆满、更完美些,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的使节未能出席,因为没有邀请他们。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了我们的大家庭,想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他们是有这种力量和信心的。我们可以耐心地等待他们清醒过来。我们应该更加团结一致,迎接新的、更大的胜利。”<sup>①</sup>

对斯大林讲这番话时的气氛,师哲描绘说:“谁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在此提到南斯拉夫的问题,大家屏息静听。”可见,与会的人都感到斯大林在这种场合提南斯拉夫问题是不协调的。

俗话说,锣鼓听声,听话听音。斯大林这一段突如其来关于南斯拉夫的话,显然是说给他的中国同志听的。这对毛泽东不能不是一个强烈的刺激。

1945年,东欧各国最初在斯大林的同意下,建立的是人民民主制度。后来所以急于向社会主义转变,大体上是由于美国从1947年执行马歇尔计划,企图通过从经济上对东欧各国进行援助达到在政治上离间其与苏联的关系,引起了斯大林的警惕。在斯大林的指示下,从1948年起,东欧各国开始由人民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并基本上照抄了苏联模式。这种急剧转变的迅速实现,似乎向人们表明,只要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占了优势,经济上有苏联的援助,就有可能向社会主义转变。

按毛泽东的“倔强”和“一向不服输”的性格来看,中国共产党引为自豪的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与东欧各国有很大的不同,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

---

<sup>①</sup>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

的。东欧各国在建国后不到三年时间就可以向社会主义转变,那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政权完全巩固,经济迅速恢复,公私经济比重已是国营经济占据优势,又已找到了通过互助合作引导个体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这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更不在话下了。

因此,在1952年9月2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后,提出了从现在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sup>①</sup>

1952年10月,趁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联共(布)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机会,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向斯大林报告中共中央关于中国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这个举动,既有征求斯大林意见的一面;也包含有向斯大林表示中国共产党绝非“铁托”。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这一决策表示赞赏,他对刘少奇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sup>②</sup>

如果说,1950年中国共产党决定抗美援朝,使斯大林开始改变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看法,那么中国将开始按照斯大林模式搞社会主义,这无疑表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完全值得信赖的。

由此可以窥见,在国民经济刚刚恢复、有计划建设尚待开始的时刻,毛泽东就急于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与他的“倔强”和“不服输”的性格有着某种关联的。

### 三、他认为可行的大事,你越坚持 说不行,他越不相信

如前所述,毛泽东自信性格的一个最大特征是迎接挑战,逞强好胜。老一

---

①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236页。

②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33~534页。

辈“三农”问题专家杜润生根据他与毛泽东接触的亲身感受说：“毛是不能被激的，他认为可行的大事，你越坚持说不行，他越不相信，更加激活他极强的反向思维。”<sup>①</sup>

何以得出这个结论，要从建国后的农村发展道路说起。从1949年冬开始到1951年党内对农村的发展道路就出现了争论，核心问题是是否允许农民单干致富。以东北局书记高岗和中共山西省委为代表的意见是，放任农民单干就是走向资本主义，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通过互助合作以动摇、削弱和否定私有基础；刘少奇、薄一波等认为农业生产现在还是靠手工劳动，单干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是有的农民上升为新富农也不可怕，只有具备机械化的条件才能搞集体化，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就想搞社会主义，那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落后的、反动的。对党内高层这两种不同意见，毛泽东否定了刘少奇等人的主张，批评这是一种右倾思想，认为通过互助合作是把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简单协作也能产生新的生产力；批评现在不能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的观点是右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第一个互助合作决议（草案），于1951年12月由中共中央批准发布。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把农村的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sup>②</sup>。

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规定用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资本主义绝种。所以，1953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两次找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陈伯达和廖鲁言谈话，批评春天“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打击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批评邓子恢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言不及社会主义。毛强调办合作社，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对下面要摊派数字。根据毛泽东谈话的精神，当年召开的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决议把互助合作的重点由组织互助组转向组织合作社，这样很快在1954年冬到1955年春合作化出现了一个大冒进，搞得农村杀猪宰牛，毛泽东也说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了。不得不同意邓子恢的意见，对农业社进行整顿，并进行适当收缩。毛还概括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

---

① 《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78页。

缩,三曰发”。<sup>①</sup>但到夏天,毛泽东听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意见,说党内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搞社会主义。7月31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坚持合作社要稳步发展是“小脚女人”,提出当年由六十万个社发展到一百万个社,邓子恢无奈作了检讨,表示赞同发展到一百万个社的计划。但没过几天,毛又找邓谈话说,一百万个还是少了一点,可不可以翻一番,发展到一百三十万个。邓子恢认为,刚定了一百万个,而且办社要有一定条件。表示不能同意。毛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sup>②</sup>

正是这个过程,使杜润生感受到毛泽东这种好强的性格,所以,杜老说:“毛是不能被激的,他认为可行的大事,你越坚持说不行,他越不相信,更加激活他极强的反向思维。”

就在这时,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批邓子恢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他亲自为各地报来的农业合作社的典型材料加写按语,编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称农民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在层层批右倾的政治氛围下,农业合作化1955年冬就基本上完成了。

对农业合作化如此顺利的实现,使毛泽东异常兴奋,他对秘书田家英说,他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逢先知在一篇回忆田家英的文章中写道:“这个话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态。对毛来说,全国解放是早已料到的,早有准备的,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样快,这样顺利,却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向认为,改造五亿人口的个体农民是最艰难的事业,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做许多细致的工作才能完成。谁知道,这么困难的问题,经过一、二次会议,作一篇报告,就如此顺利地解决了,那么,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困难的问题不能解决呢?”<sup>③</sup>

由此,毛泽东得出结论,看来其他各项工作,也要批右倾保守,这样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就能大大加快。

---

① 杜润生:《五十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见面》,载《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②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380~381页。

③ 董边、谭德山、曾自:《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 四、毛说定了的事，绝不允许别人反对

1955年11月30日、12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的中心思想，就是在各项工作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加快建设速度，并且提出，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反对右倾保守主义为中心。他强调说：“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毛还告诫说：“搞工业的同志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可能。特别是重工业千万不可骄傲，因为我们既无经验又未搞好，工业体系还未建设起来。有人说：‘可不可以让农业等一下工业，不要走得那么快。’这种说法是右的。不能叫农民等，而是工业要赶上去。”<sup>①</sup>

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提出了要在各行各业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毛说：“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sup>②</sup>

正是在这思想指导下，经周恩来、薄一波、李富春等酝酿提出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性口号，对此，毛泽东十分赞赏。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明确地把反对“右倾保守”的口号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并列提出。

---

<sup>①</sup>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77～779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页。

<sup>②</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



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亲自审阅并称赞“写得很好”。1月26日,《人民日报》又公开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的《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求在12年内粮食每亩的平均产量,在黄河以北地区由150多斤增加到400斤;淮河以北地区由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以南地区由400斤增加到800斤。棉花(皮棉)由每亩平均35斤,分别增加到60斤、80斤、100斤。到1967年,粮食年产量达到1万亿斤,棉花年产量1亿担。

多、快、好、省方针的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公布,反对右倾保守造成了逼人形势,各级领导人的头脑也开始普遍发热,按毛泽东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各地和中央各部门纷纷把原设想12年或8年完成的任务,提出要提前在五年甚至三年内完成,于是,1956年的经济建设计划开始膨胀(1955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即基本建设投资112.7亿元,比1955年的预计完成数增长30.4%,比一五计划中规定1956年投资额增长12.4%;据国家计委1956年1月5日报告,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额已达153亿元,后来又增加到180亿、200多亿元,比1955年预计完成数增加了一倍以上),从而出现了“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的混乱局面。<sup>①</sup>

早在1956年2月份,各种基本建设材料就出现紧张形势,显露出急躁冒进的苗头,周恩来领导国务院已开始在“救火”。但在4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再增加2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毛的这个意见,遭到与会人员的一致否决。这件事情对毛泽东的影响,胡乔木、邓力群都有回忆。

胡乔木说:“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sup>②</sup>

<sup>①</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1~532页。

<sup>②</sup>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第269页。